

诺奖的国际政治学。何谓『白俄罗斯文学』?

林精华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10月8日,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白俄罗斯籍的女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CNN报道说,“她是107位获得该奖作家家中的第14位女性”,并辑录她的论述,如“每个普通人都有自己微弱的个人命运史”。乌克兰总统发文称出生于乌克兰的女作家获奖是乌克兰的骄傲,但她并非用乌克兰语创作。女作家不仅是白俄罗斯国民,且创作语言之一即白俄罗斯语,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办公室发布祝贺信称“您的创作,触及的不仅仅是白俄罗斯人的感觉,而是许多国家的读者共同心声”。令人疑惑的是,作家主要以俄语创作,且成名在苏联时代,苏联解体后她仍多次获俄联邦文学奖,却未激起俄罗斯读者、作家和政府的兴奋,相反,俄国作家协会两主席之一的科鲁滨及时发表关于她获奖的措辞严厉的言论。与之相呼应的是她获奖后的发言,提及乌克兰危机——当下欧洲、俄罗斯和独联体最敏感话题,批评俄罗斯政府对东乌克兰分离主义战争应负责任;但在接受广播公司采访时却说获奖感受很复杂,“这个事件直接唤起的是蒲宁、帕斯捷尔纳克这些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名字”,又称这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诺奖颁给一位出生于乌克兰、主要用俄语书写的白俄罗斯女作家,无论初衷如何,最终却引人关注是否存在“白俄罗斯文学”、能否把俄罗斯—苏联时代那些被强行纳入版图之中的非俄罗斯民族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剥离开来、重新思考“苏联”及其遗产问题。

这不是危言耸听:无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初衷如何,借助诺贝尔文学奖肢解俄罗斯文学,绝非空穴来风。1932年,授予蒲宁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继承了俄罗斯散文优秀传统”:很明确地把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区分开来,以此暗示苏联文学是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中断。这在冷战时代成为惯例,如帕斯捷尔纳克的获奖理由是“在当代抒情诗和俄国史诗传统上都取得了极为重大的成就”;索尔仁尼琴获奖是“由于其道德力量,借助它,他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1987年,10年前加入美国国籍的约瑟夫·布洛茨基“由于对作为作家身份的全身心投入,以清澈的思想和强烈的诗情感染于人”而获得诺奖。

斯维特兰娜的身份、人生历程、文学活动主旨、所在国和所关心的国家问题等,以及2013年以来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之局势,显示出此次诺贝尔文学奖同样具有国际政治学效应。1948年,斯维特兰娜出生于乌克兰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斯坦尼斯拉夫州的混血民族之家: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则是乌克兰人。这种出身及人生历程,深刻影响了她后来的文学活动。她的出生地是后苏联进程中乌克兰的一个重要地点——伊凡诺-法兰克福州——乌克兰西部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2013年11月份以来的乌克兰危机与这里有关——当地居民和地方当局强烈主张乌克兰加入欧盟、北约,与俄罗斯接壤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居民和地方当局,则在对乌克兰的认同上,持完全对立的态度。

1972年国立白俄罗斯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后,她先后担任历史和德语教师,在当地报社工作,后在白俄罗斯作协主办的《涅曼》月刊工作,1983年加入苏联作协。她工作后的文学活动,并不直接表达白俄罗斯民族身份认同问题,而是和当时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以激烈批评苏联社会问题而著称。

1985年出版的俄语小说《最后的见证者》,是其第一部文献性的中篇小说,内容选自阿列克谢耶维奇访谈的几百位亲历二战的白俄罗斯女性,她们代表了苏联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千万女性的命运。当年保加利亚译本出版,第二年中国推出汉译本。然而,该作问世于新思维之前,审查制度批评她创作有自然主义和诋毁苏联妇女的英雄形象的倾向,但不到5年时间,该作发行量达200万之巨,被批评界誉为“文学小说的出色大师”,屡获大奖并被搬上话剧舞台。

《切尔诺贝利的祷告:未来编年史》,采访了二战期间白俄罗斯的孩子,实录他们对二战的见闻,包括战争突然就来了、和平生活由此消失。这些口述性作品展示出白俄罗斯作为卫国战争前线的境况,颠覆了苏联官方对卫国战争的宣传。

《铍制男孩》(汉译《铍娃娃兵》)是对10年间不同时段参加阿富汗战争的苏联士兵的访谈,由此实录和苏联官方宣传完全相反的真相。作者以逼真的叙述质疑这场成为苏联解体原因之一的战争,却遭到参战士兵的家属批评,直到苏联解体后,还有人因此向法院提起诉讼。

《切尔诺贝利的祷告:未来编年史》辑录亲历核辐射区的原苏联人的灾难记忆,重现核大国苏联及其集权体制,其遗产对乌克兰的威胁,没有随着苏联的逝去而终止。

创作于2013年的《二手时代》记录后苏联社会转型中不同阶层的普通人找不到生活方向,经历了梦想破碎及恐惧。在作者看来,这种叙述是在五花八门的细节中展示苏联遗产给人们带来怎样的感受、状态和理解。

阿列克谢耶维奇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不仅真切呈现二战、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事故、后苏联社会转型等重大事件,而且展示亲历者关于“苏联”的认知,正如萨拉·丹尼乌斯在宣布授奖消息时所解释的,“斯维特兰娜是超常作家。过去三四十年,她一直忙于绘制苏联和后苏联的个人地图,而不见得是事件的历史,而是情感的历史——她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真正情感的世界,所以她在各种作品中描绘的这些历史事件……仅仅是探索苏联的个人和后苏联的个人之潜文本”,她在文体探索上创造出“集体小说”、“小说—宗教剧”、“证据小说”、“合唱诗”等,塑造“讨论自我的”等。按其作品的译者薇拉·沙耶维奇所说,“除了真实之外,不再有其他东西……这次她获奖,将意味着有更多读者要接触到她作品所描绘的那些经历苏联历史悲剧之幸存和绝望的形而上维度”。

后苏联时代流行“历史文学”,即苏联亲历者感性描述自己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其中,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作家在经历了否定苏联风潮之后,因为俄罗斯日渐有序、富裕、强大起来,自1990年代末以降,开始转而对自己经历的正面怀旧。但后苏联的独联体国家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绝大多数还健在的苏联时代著名作家,对苏联是否持肯定性叙述的,其中包括乌克兰裔的苏联时代著名卫国战争题材作家瓦西里·科夫。视贝科夫为文学导师的斯维特兰娜亦然。

也就是说,斯维特兰娜获奖的意义,远不只是要彰显非虚构这种文类的叙述魅力。按她所论,“我长期寻找那种能回答我是怎样看见世界的文类……最终我选择人类不同声音的文类。我的书,是我出街头,在室外,认真观察和聆听而来的……今天,当世界和人变得如此多样化时(艺术则越来越承认自己的无力),



是不存在的……当然,我祝贺白俄罗斯文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我要重申,她无法把白俄罗斯作家分离出来……白俄罗斯文学,是一种强有力的文学,但因为政治化的女作家而获得诺贝尔奖。”

对于这样的论述,《华尔街日报》批评:“在俄罗斯,一些民族主义者已经批判斯维特兰娜,指责她痛恨俄罗斯,会激起欧洲反俄情感”。这也令人思考斯维特兰娜获奖与白俄罗斯文学有何种关系。

所谓“白俄罗斯文学”,显然是用白俄罗斯语言创作并表达白俄罗斯人审美诉求的文学。白俄罗斯文学史家主张:14—16世纪在立陶宛大公统治下,白俄罗斯文学传统开始形成,确定了古白俄罗斯语的官方地位,1517年布拉格刊行了弗兰齐斯科·斯科林纳用古白俄罗斯语翻译的《圣经·赞美诗》,16—17世纪在波兰文化影响下出现了巴洛克诗歌和戏剧;18世纪,因信仰东正教的农民和商人的阻止,白俄罗斯出现波兰化趋势,古白俄罗斯语逐渐衰落了;18世纪后期,白俄罗斯知识分子努力恢复民族语言文学,出现了古白俄罗斯语的杰作马尔舍夫斯基《悲剧》和《被奴役中的自由》;19世纪延续这一趋势,产生了一系列著名作家及其力作,如维列尼钦的《帕纳斯山上的塔拉斯》、拉温斯基的《反常的艾涅伊达》、杜林—马尔钦克维奇的歌剧《萨良卡》等;在19世纪后半期,现实主义文学有长足发展,出现了现代白俄罗斯文学奠基人巴库舍维奇。1905年后,白俄罗斯文学进入短暂繁荣期,如恰洛特及其长

- ①《切尔诺贝利的祷告:未来编年史》俄文版
- ②《铍娃娃兵》俄文版
- ③《战争中无女性》俄文版
- ④《最后的见证者》俄文版

诗《赤脚站在火场上的人》,叙述白俄罗斯人对俄罗斯革命和内战的观察。苏联时代,白俄罗斯作家仍保持着白俄罗斯文学传统,出现了阿达莫维奇及其《游击队员》《最后一个假期》《我来自热情的乡村》,以及他与格拉丁合作的《围困之书》等作品;尤其是瓦西里·科夫,他创作的长篇小说《砂石》和诸多中篇小说,在苏联时代独具一格。

但是,在俄罗斯文学史家看来,17世纪之前根本不存在白俄罗斯语言书写的文学。他们认为,10—17世纪,白俄罗斯文学、乌克兰文学、俄罗斯文学是一体的;所谓古白俄罗斯语即西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一样,都是古罗斯语的方言,是古罗斯语的民间称呼;而18世纪以后白俄罗斯文学是俄罗斯帝国文学的一部分;苏联时代白俄罗斯文学是苏联加盟共和国文学,并非独立的,尤其是二战结束后,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获得解放并统一,布罗夫卡、潘琴柯、唐克等作家发表了讴歌统一的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作品,1950年代白俄罗斯作家沙米亚金长篇小说《深流》、梅列日《明斯克方向》、雷恩科夫《难忘的日子》等,积极叙述十月革命、农业集体化等苏联文学共同题材。1960年代以后,被斯维特兰娜视为导师之一的阿达莫维奇,其作品实际以积极叙述苏联而著称,而她的另一位导师瓦西里·科夫在“诸多作品,基本上以苏联卫国战争为题材,在基调上和当时的苏联文学毫无二致。”

面对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关于白俄罗斯文学的截然不同论述,斯维特兰娜获奖自然会促使读者思考。按斯维特兰娜对明斯克独立报《我们的田地》所说,“这绝不是对我个人的奖赏,而是对我们的文化,我们这个国家的肯定”。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白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和俄罗斯、波兰纠缠不清,因而白俄罗斯文学不仅仅是白俄罗斯语创作的文学,可能还包括帝俄时代—苏联时代用俄语创作的白俄罗斯裔作家,只要他们表达了白俄罗斯民族认同;而俄罗斯帝国时代以及苏联—后苏联时代,那些用俄语写作的文学,未必都属于俄罗斯文学,有的可能属于乌克兰文学,有的则属于白俄罗斯文学,如瓦西里·科夫1993年以来的文学创作,完全不同于苏联时代,他对那场俄联邦仍继续称之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叙述,已经渗透有强烈的白俄罗斯意识。

此次诺贝尔文学奖的国际政治学效应,姑且不论评审的如何,至少客观结果已经显示,虽然按诺贝尔文学奖常务秘书萨拉·丹尼乌斯的解释,“诺贝尔文学奖奖励的根据是文学,仅仅如此。它从来不是政治奖项,未来也永远不会。”

聚焦诺贝尔文学奖

我的阅读 追寻真实的勇气和意义

□远人

10月8日,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国内无数读者来说,阿列克谢耶维奇可能是个比较陌生的名字,尽管国内曾出版过她的著作,但一是不多,二是没有在当时产生强烈的反响。十余年前我读她的《战争中无女性》《铍娃娃兵》和《切尔诺贝利的祷告:未来编年史》等著作时,虽感震撼,但直到她获奖的消息传来,才重新想起这位女作家的名字。

或许对阿列克谢耶维奇来说,更重要的是自己是否在作品中呈现出了要追寻的真实。出身记者,使阿列克谢耶维奇对真相的报道有本能的职业意愿。但想要探寻事件的真相,艰难倒在其次,真正的难度在于追寻者是否具有说出真相的勇气和胆识。在阿列克谢耶维奇成名作《战争中无女性》里,无处不是血淋淋的悲惨遭遇,但作者在书中肯定了源于理想而甘愿牺牲的人生价值,读者在最后也能看到有旗帜在鼓舞人心地飞扬。而从《铍娃娃兵》开始,阿列克谢耶维奇跳出了当时苏联文学所要求的胜利画面,在文字中不再化妆和掩饰,让事实呈现在笔下显示出真实的残酷一面。

对阿列克谢耶维奇来说,长年累月在数百个地方奔波采访,面对的事实真相让自己震惊,乃至在日记中发出“我对自己说:再也不愿意写战争了”之句,甚至连看见儿童流血也会痛苦得“扭头就跑”。她最终能扛住这些痛苦,就在于不断追问,如果真实反映在文献中,“那么什么是文献呢?人们可以控制它到什么程度呢?它在什么程度上属于人们,又在什么程度上属于历史和艺术呢?”这些追问带来的痛苦和勇气都集中在《铍娃娃兵》这部纪实文学之中。该书的记述时间和事件是苏联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到1989年2月撤军前夕。10年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动荡集中在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的一个个普通人身上。这些被访对象有掷弹筒手、有军事顾问、有卫生指导员、有公务员、有通信兵、有军医、有女护士,还有无数死难者的妻子和母亲等等。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著作就是由这些采访对象的原话构成,因而也使得活生生的现场画面呈现在读者面前。对普通士兵来说,服从的只是命令,但在命令带来的现实中,这些普通人唯一能够认识到的,就是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一件东西罢了”,而且,在充满强弱并存的“生活”中,强者“夜里可以把他(年轻的士兵)叫醒,用椅子、用棍棒、用拳头打他,用脚踢他。白天可以在厕所里揍他,把他打个半死不活”,还可以命令他“把我的袜子舔干净了,好好地舔一舔,让大家都能看见”。痛苦不仅在自己的军营,这些士兵还随时面对死亡,他们能够从缴获的武器中体会那些“都是用来消灭你的”,被地雷炸断腿和炸瞎眼的工兵只有“在夜里,在梦中”感觉自己在“孩子们前面”又有两条腿,我的眼睛又能看见东西了”。他们还逐步发现,“阿富汗不是吸引人的故事,也不是侦探故事影片”,甚至还会发现,现实无情,普通人不会觉得他们身在历史,而是面对每天的屠杀和恐怖。但没有人将这些恐怖和屠杀公开,作为个人的痛苦也从来没有被下过命令的政府在意。不仅自己的痛苦和死亡,连后方家人的痛苦也没有被任何人在意。电视上“苏联士兵与阿富汗士兵称兄道弟”“将鲜花堆上装甲车”的场面不过是为了欺骗后方的母亲,因为她们的儿子多半在“还没有被训练成一个兵”时就被送上战场。谁都知道战争必然带来痛苦和死亡,但通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采访,我们真切感到,在无能为力、普通生命之中,所有个人活着的意义都被巨大的谎言一笔勾销,更可怕的是,战争中的士兵在死亡威胁下,干的却还有“用棺材偷运毒品”“偷运皮大衣”,甚至把一串割下来的敌人耳朵串起来当战利品,苏联哨兵将抢救对象放在阿富汗孩子身上……所有这些复杂的、充满怜悯的现实都在那些受访对象口中倾吐,阿列克谢耶维奇如实地将它们记录,没有褒贬,只有真实和呈现,而驱使她呈现这一痛苦的,恰恰是她不能面对每个人命运的关切,这也使她的作品成为对现实的拷问之书和控诉之书。

在以俄语写作的作家中,阿列克谢耶维奇是继蒲宁、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后入美籍)等人之后再次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对这些作家而言,追寻真实的勇气和担当指引着他们在不同时代写出不同震撼性的作品。和其他国家作家相比,俄罗斯作家对于真理的思考和探索显得格外富于重量。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看,难说她要接上俄罗斯的宗教传统,但能肯定一点,她要接上的是俄罗斯传统文学中的苦难感和真实感。这种苦难和真实并不独属俄罗斯,但因“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而获奖,其理由却更应属于一位以俄语写作的作家。回顾20世纪,俄罗斯所经历和承担的苦难最能代表人类和历史所承担的苦难。从这点来说,阿列克谢耶维奇此次获奖,也许比另外一个追求纯文学技艺的作家获奖更具催人思考的意义。